

批判的位移

葛兰西与文化研究转向

周兴杰 著

Pipān
Weiyi

De

GE LANXI YU WENHUA
YANJIU ZHUANXIANG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批判的位移

葛兰西与文化研究转向

周兴杰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批判的位移:葛兰西与文化研究转向/周兴杰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10

ISBN 978-7-5004-9703-5

I. ①批… II. ①周… III. ①葛兰西, A. (1891~1937)-文化思想-思想评论 IV. ①B546②G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60843 号

责任编辑 郭晓鸿(guoxiaohong149@163.com)

特约编辑 丁国旗

责任校对 李 莉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298 千字

定 价 4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为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09YBB156）

◎本书为湖南科技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社会文化研究基地”成果（湘教通[2004]2343）

◎本书受湖南科技大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

◎本书受湖南科技大学博士学位授权立项建设支撑学科“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经费资助

代序:转向葛兰西

2005年前后，我在广州暨南大学认识了周兴杰。当时他仍在攻读博士学位，导师是暨南大学的蒋述卓教授。身为一个文学院的博士生，小周的毕业论文，大胆选择了葛兰西的文化理论为题。

葛兰西是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思想家之一，他在欧美的学术影响很大，牵扯的问题也很复杂。然而在中国，葛兰西的翻译著作较少，研究资料严重不足。再加上国内学界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些禁忌，小周的导师蒋老师，因而对这一选题不甚放心。于是他请我过去，帮忙把把关。

我看了小周的论文提纲，感觉有三个长处：（1）该生理论兴趣强烈，尤其喜欢思考哲学问题，（2）他对葛兰西的把握，主要来自欧美左派的再思考、再评价，（3）该生具有相当强的治学动力，可望在此题上有所作为。

蒋老师听了我的意见，便放手让小周去写论文。2006年春，小周顺利通过答辩，而且获得了好成绩。旋即返回湖南老家，在湘潭的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找到一份工作。从那以后，他就在芙蓉国里兢兢业业，教书至今。

最近四五年，我大约每年都要去湘潭一次，或讲学，或开会。因而常同小周在湘潭见面，也几次谈到葛兰西研究的各种新动向、新问题。让我高兴的是，小周虽然做了副教授，可他做学问的兴趣非但不减，反而日益凝重专一，变得深思熟虑起来。

这里，我们有幸看到一本葛兰西研究的新书。我之所以说它“新”，不仅

是因为其中的研究资料新颖充裕。它所讨论的问题、所发表的见解，也大幅度更新换代了。难能可贵的是，小周这五年来孜孜以求，将葛兰西研究同中国国情相结合，认真思考了一系列颇有意义的“中国式”问题。这一治学方向，我以为是国内博士生应当加以关注、并努力更上一层楼的。

赵一凡

2010年12月20日于海口万恒花园

导 言

“学于人然后更知己，学于己然后更知人”，^① 葛兰西如是说。

相互研习，能够深化对自我的认识，反思自我，能够增进对他人的理解。不同文化、不同地域的人克服重重障碍彼此学习、相互交流，或多或少都与这一美好意愿有关。然而，向谁学习？学习什么？为什么要学？在每一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会因人、因时、因事而异。

中国知识界大举向西方学习，至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中国文论界向西方学习，近三十年来更是蔚为风尚。特别是近二十年来，市场经济日趋成熟，社会风尚、文学气候迅速变化，大众文化乘势而起，成为牵动人心的文化景观。这促使大众文化研究成为当代文论界不容回避的课题。适逢其时，英美“文化研究”风潮登陆中国，它一面推动文化研究成为当代“显学”，一面也引发无数争议。

这一局面至少向我们提出两个相关联的问题：中国文化研究应该如何做？英美的“文化研究”究竟又确立了怎样的新的人文学术研究范式？说这两个问题相互关联，是因为既然中国的文化研究无须讳言有借鉴、承袭西方的一面，那么厘清西方文化研究中的相关问题，特别是一些核心问题，对我们构想如何着手文化研究实践，乃至丰富和推进中国当代文论研究发展，都应不无裨益。

^① Richard Bellamy 选编：《葛兰西狱前著作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2 页。

思考中国文化研究怎么做的问题意识也促使我们回顾中国做过怎样的“文化研究”。面对刚刚兴起的大众文化和正在蔓延的商业文学氛围，敏锐的理论界已经有过一次热烈的论争，那就是有关“人文精神”的大讨论。本次论战涉及范围极广：人的主体性、市民社会、社会转型与道德重建、知识分子的立场与社会职能、终极关怀与世俗品位……不一而足。^① 本文无法全面回顾这一论战，只是强调一点，那就是在此前后，针对大众文化，隐然出现一种精英主义与市民（如果不是“市侩”的话）主义二元对立的批评局面。精英主义从人文精神的云端俯视大众文化，鄙夷其为金钱腐蚀艺术的结果，是道德滑坡之表征。市民主义则肯定当下生活的合理性，反倒质疑人文精神，把大众文化当做市民阶层自我世界的本真呈现。然而，大众文化果真如此非黑即白吗？今天看来，二者对大众文化本质的认识，多少有独断论之嫌。那么，如果我们不同意这种认识方式，我们又该如何结合对象，辨析大众文化具体呈现出来的复杂面貌与属性呢？因此，如何将这些问题的思考推向深入，如何从这种范式对立的僵局中突围，实际上成为中国大众文化研究进一步深入必然要面对的课题。

事实上，二元对立的批评格局也曾西方存在过。这就是伯明翰学派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过的“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的严重对立。对立双方对（西方）大众文化的态度，与中国的两种批评立场恰好分别对应。即文化主义视大众文化为工人阶级的自主创造，结构主义却把它看做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炮制的精神迷汤。二者相持不下，文化研究不知该何去何从。

山重水复之际，他们想起一位故去多年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葛兰西，借助其思想遗产，文化研究不但摆脱自身困境，而且将影响扩散到全球范围，真正地走向柳暗花明之境。世称这一学术转折为“转向葛兰西”（Gramsci return），而葛兰西的思想影响力，就此绵延不绝。于此中西巧合之中，不难判断，选择“转向葛兰西”为研究对象，实为一个非常有针对性的选题。一般而

^① 参见王晓明主编《“人文精神”寻思录》（一至四辑），文汇出版社1996年版，以及文理平：《关于“人文精神”讨论综述》，载《文艺理论与批评》1995年第3、4期。

言，以学术思潮的转折点为题，实际上就是意欲占据起伏跌宕的学术思潮史的一个潮头，由此居高临下，可以俯瞰潮起潮落两面的风景，把握学术脉络走势，辐射毗邻理论问题，收到以点带面、深广相宜的研究功效。具体到本文语境，研究“转向葛兰西”，可以帮助我们把握西方文化研究的发展脉络，总结其转型成果，进而由此伸发开来，思索文化研究转圜变化与西方左翼思想主题更迭之关联，探究其能成为一种全球风行的研究范式之因由。这样，不仅可以明确文化研究如何破除二元对立思维等重要问题，而且对于整个西方左翼思想变局也都可有所把握。由此回望中国文化研究，对于我们超越非褒即贬的对立批评形态，构想符合本土文化特性的批评范式，也能收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效果。

然而，要理解文化研究何以转向葛兰西，首先必须了解葛兰西。遗憾的是，在中国，葛兰西这位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他的思想很长一段时间内却较少受到关注。这种少有人问津的状况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才有所改观。出于批判机械唯物主义、庸俗经济决定论等思想迷雾的需要，国内从俄文版翻译了《狱中札记》（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葆煦译），从意大利文版摘译了《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年版，吕同六译）、《葛兰西传》（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费奥里著，吴高译）等书。毛韵泽也出版了半传记、半研究型的《葛兰西：政治家、囚徒和理论家》。哲学界开始在一定范围内讨论葛兰西的“实践哲学”（这一讨论持续到 90 年代）。不过，在那个思潮涌动的年代中，葛兰西的声音并不洪亮。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与全球经济、政治和文化体系的关联更趋紧密，国内的文化产业进一步发展，后殖民批评、文化研究等西学思潮也大举涌入，其连锁反应就是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陡然之间升温为研讨热点。哲学界、文论界几乎同步开始争说葛兰西。关于“实践哲学”的论战虽余波仍在，但已为“文化霸权”的强烈关注所替代。因研究的需要，对葛兰西的译介逐渐增加，出版了《葛兰西文选》（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实践哲学》（重庆出版社 1993 年版，徐崇温译），《狱中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

版，曹雷雨译）也据 1971 年的英文版再次选译。近几年译介力度进一步加大，《现代君主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陈越译）被单独译出，田时纲于 2007 年、2008 年分别译出《狱中书简》、狱前书信《火与玫瑰：1908—1926》（人民出版社）。这是近十余年来国内译介、研究葛兰西思想的大体趋势。

比较而言，哲学界的研究成果相对丰富。除一些有分量的文章之外，哲学界还出现了三篇与葛兰西研究密切相关的博士论文。中山大学黄伊梅博士的《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及其当代意义》是迄今为止唯一一篇专论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的学位论文。中国人民大学孙晶博士的《文化霸权理论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已经出版。在这篇论文中，他将葛兰西、法兰克福学派、福山以及当代一些文化思潮皆划入“文化霸权”理论。此外，还有黑龙江大学于文秀博士的《“文化研究”思潮中的反权力话语研究》。而文论界除了一些散论之外，赵一凡在《西方文论讲稿续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 年版）辟出专章，对葛兰西思想进行了详细讨论。孟繁华则在《传媒与文化领导权》（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中，借助“文化霸权”理论研究了传媒对建构中国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推动作用。

必须承认，虽然国内对葛兰西的研究在不断推向深入，但整体地看还是述介多于剖析，重复多于创新。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整个学界对葛兰西思想的陌生。因此，就中国语境而言，欲理解文化研究的“转向葛兰西”，一项首要而基本的工作，就变成了理解葛兰西。

而当我们由此将目光投向国外时，则发现域外葛兰西思想研究之发达，令人惊叹。与此相应，其思想的影响也从政治、哲学、社会学弥散开来，一路波及文学、人类学、历史学、教育学乃至国际关系学。这种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态势，也使国外对葛兰西的研究是六经注我，各取所需，因而难以尽述。根据研究重心变化，我国学者仰海峰提出“三阶段”说。第一阶段从 1938 年至 20 世纪 60 年代，研究主要集中在意大利，重点是“从政治视角关注葛兰西思想对党的理论建构的基础性意义”。代表人物是陶里亚蒂。第二阶段从 60—90 年代，此时葛兰西思想开始赢得国际声誉，逐渐红遍西方。人们开始着重揭示葛

兰西思想的独创性，从各种知识背景和思想需要来重新阐释葛兰西。代表人物有阿尔都塞、波比奥等。第三阶段则从 90 年代到现在，特点是将葛兰西思想后现代化，代表人物如拉克劳、墨菲等。^①“三阶段”说为我们大致划清了西方葛兰西研究的发展脉络。实际上，各阶段研究彼此交叉之处甚多，比如对葛兰西思想的后现代阐释实际是 20 世纪 80 年代对葛兰西思想某些再阐释的一种延伸，如此，我们以《文化霸权和社会主义战略》（1985 年）一书问世为标志来区分这两个阶段也未尝不可。对本论题而言，这种三阶段划分有助于我们认清两件事：一是文化研究的“转向葛兰西”其实是葛兰西思想国际化的产物，或者说存在着一个西方当代人文社会学术的“葛兰西热”，文化研究转向不过是其中一部分；二是这是一个将葛兰西思想经典化的阶段，也是一个各取所需的阐释阶段，根据本论题，我们需以雷蒙·威廉斯、斯图尔特·霍尔等文化研究代表人物的阐释为重点，兼顾此一阶段对他们产生影响的其他观点、认识（如佩里·安德森、拉克劳、墨菲等），来了解文化研究是如何理解、转化和再阐释葛兰西思想的。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发现文化研究的“转向葛兰西”，实与当代西方人文学术研究的“葛兰西热”，特别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或者说左派思想主题转换紧密相连。故此，我们将论题进一步明确为：从西方左派思想变迁的视境来看，文化研究两种范式对立的实质是什么？葛兰西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哪些帮助？文化研究的转向是如何发生的、取得哪些成果？这样，结合中国研究现状，本研究确定两项主要任务：一是研究葛兰西文化思想，解答其思想何以能解决文化研究的问题；二是考察文化研究转向轨迹，辨析其转向因由，总结其转向成果。如此，本书结构就由两部分组成，即“葛兰西文化思想研究”与“葛兰西与文化研究转向”。

第一部分，围绕我们的问题，我们尝试从三个层面阐释葛兰西思想，以促进思索他的思想何以能催动文化研究范式转型。一是学理层面。葛兰西的社会

^① 参见仰海峰《葛兰西研究七十年：回顾与反思》，载《河北学刊》2009 年第 3 期。

结构理论和人学思想包含辩证认识，有助于帮助西方马克思主义解决其内在的“结构”与“主体”的二元对立。《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提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① 如此，人们如何创造自己的历史、历史条件又是如何影响（制约或促进）人们去创造，这些就成为了历史唯物主义不容回避的问题。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语境中，“历史条件”与“历史创造者”的关系问题实际上被转换为社会结构与行动主体的关系问题（如其内部科学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对立）。当前，由于左派批评理论与其他人文学术思潮的对话与融合，“结构与主体”问题更是成为当代社会理论的基本问题之一。以我之见，正是由于葛兰西对这个问题的辩证思考和特殊理论贡献，给予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和其他人文社会研究领域以多方面启示，从而能够在当代社会文化理论领域产生持续影响。而葛兰西理解的“结构”不是别的，正是由市民社会与国家组构而成的现代西方社会结构，他理解的“主体”也就是这一社会结构中的群体或个人。因此，探讨葛兰西对这二者的独特认识，就构成了本论题研究的重中之重。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将这一层面的问题分为两章，分别进行专门讨论。

同时，我们认为，“葛兰西热”的出现与西方 20 世纪 70 年代政治语境密切相关。“五月风暴”之后，西方左派激进思想主题转换，由自由主体问题转向结构的深层关系问题，而英国文化研究的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的对立，恰好与这一主题对应。文化主义由强调文化自律到迷信主体自主，结构主义则从揭示文化结构自主一变而为确认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主体的绝对宰制，因此，这两种批评范式的对立实质是“结构”与“主体”的对立。因而，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因对立而陷入的理论困境，实质是由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辩证认识的轨道造成的。而葛兰西对“市民社会”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阐发，对人、特别是群体中的人的“能动/顺从”二重性的揭示，对“历史集团”和“有机知

① [德]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8—9 页。

识分子”的历史作用的揭示，都直接或间接地回应了西方左派的当代思想困境。换言之，葛兰西对“结构”与“主体”关系的辩证认识，是他能帮助文化研究摆脱思想困境的根本原因。

二是策略层面。葛兰西构想的“阵地战”战略，弥补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战略贫穷”。《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中，佩里·安德森毫不客气地指出，理论与实践脱离，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弊端。他们因此而缺乏战略思考。葛兰西的“阵地战”，正好弥补这一空白。能够如此，根本还在于葛兰西遵循“改造世界”的哲学目的，将哲学、理论政治化为“实践哲学”。而“绝对历史主义”则是有意区别于经济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与历史的实践统一性层面上，凸显伦理政治史以改写经济决定论的化约式历史叙述。历史既然不为抽象规律决定，人们当然需要行动起来创造历史，也就需要相应的行动策略。“阵地战”战略就是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怎么办”问题的具体回答。它以葛兰西对西方社会结构的认识为基础，渗透实践意识和历史主义精神，寄望知识分子与群众相结合的文化运动来争夺文化霸权。因此，本章讨论，实则涉及理论与策略两个方面。将看似分离的二者并置研讨，是为了表明，此一战略的制定，虽离不开葛兰西的斗争经验，其实更有坚实的理论根据，并非所谓权宜之计。由于“阵地战”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故而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英国新左派感受新的政治氛围，重新希求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渴望学术实践与政治实践的结合时，他们才会如此青睐葛兰西。

三是操作层面。葛兰西关于文化的一些思考，特别是他的文艺批评，是其策略构想的具体操作。从其批评分析中我们能更经验性地体会到，葛兰西为什么提出要争夺文化霸权。尤其是其“人民—民族”的文学、文化观，不但揭示了争夺文化霸权的关键，而且表明他自始至终坚持群众性文化路线，这对我们在当代语境中思考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问题，非常具有启示意义。由此展开的分析也表明，葛兰西其实早已是一位大众文化研究者，故而英国文化研究乞灵于他，也就并非空穴来风。

第二部分，在澄清葛兰西文化思想的基础上，我们着手清理文化研究转向

轨迹，揭示其转向因由，并总结转向成果。

在“转向因由”的讨论中，由于我们已经指出了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二元对立的问题实质，故此，在这一章我们着重指出，文化主义不仅是对阿诺德、利维斯主义批判传统的继承和扬弃，而且是对英国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继承和扬弃。其工人阶级立场源于后者，其本质主义文化观源于前者。结构主义虽然更为主要的是阿尔都塞的影响，但列维-斯特劳斯等影响也不容忽视。此外，我们还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文化工业”和“市民社会”这三个文化研究常用概念进行了辨析、比较，以此凸显差异，发现问题。

最后，从三个方面总结“转向成果”。一是以威廉斯和霍尔的认识为主，力图揭示文化研究如何化用霸权。继而针对意识形态批判向文化权力分析这一倾向，比较葛兰西与福柯，力图揭示文化研究为何热衷于二者思想的结合。二是阐释文化研究最具独创性的“接合”理论，发掘文化研究与所谓“后马克思主义”的同与异。三是探讨“抵抗的知识分子”的立场定位。与表征危机相联系，重点揭示当代知识分子的困境，探讨葛兰西知识分子理论何以能激发文化研究知识分子突破学科化阈限，重构知识分子社会批判职能。

必须承认，解读葛兰西是一项西方学界也感觉极为头疼的工作。因为《狱中札记》犹如天书，晦涩难懂。这首先是由于狱中写作，葛兰西不得不用一种密码式的语言瞒天过海。其次，葛兰西的思考仍处于未完成阶段，《狱中札记》汇集的只是思想的吉光片羽，常常前后文义跳脱，缺乏系统性、条理性和严密性。再者，《狱中札记》于作者身后出版，打下后世编辑者的思想烙印。^①因此，从现代阐释学立场来看，寻绎葛兰西的思想原意几乎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仅如此，我们在前面就已指出，“转向葛兰西”更是旁涉诸多人文学

^① 例如，首次面世的《狱中札记》是陶丽亚蒂整理的专题性版本，这是一个根据政治需要做了重新编辑和阐释的版本。意大利葛兰西研究专家朱塞佩·瓦卡指出：“直至今日，在按时间顺序编辑的《狱中札记》版本出版20年之后，先前那个按专题出版的版本仍然无可争议地主导着葛兰西在世界不同文化范围内的形象。”见[意]萨尔沃·马斯泰罗内《一个未完成的政治思索：葛兰西的〈狱中札记〉》，黄华光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

科，关联西方左派思想脉动，其梳理和分析难度，实已无须多言。但是，研究的乐趣有时即在知难而上，只因为“无限风光在险峰”。故而，当我们穿行于葛兰西的思想迷宫，感应到西方文化研究激荡跳动的脉搏后，我们已不忍藏拙，愿意将自己些微的收获呈上，在与人分享的同时也期待批评。当然，也怀着些微的希望，希望将此彼岸风景摄入本土视境，或能组构返照的镜像。

目 录

代序:转向葛兰西	赵一凡(1)
导言	(1)
第一章 结构与主体(一)	(1)
第一节 市民社会的概念指意与理论脉络	(1)
第二节 黑格尔的思想遗产	(5)
第三节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超越	(9)
第四节 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	(24)
第二章 结构与主体(二)	(48)
第一节 “人学”在葛兰西思想中的重要地位	(49)
第二节 马克思与葛兰西“人学”的认识关联	(52)
第三节 拉布里奥拉、克罗齐与列宁	(57)
第四节 葛兰西“人学”内涵的独特层面	(68)
第三章 理论与策略	(84)
第一节 实践哲学	(85)
第二节 绝对历史主义	(99)
第三节 阵地战	(112)

第四章 文学与文化	(122)
第一节 “民族—人民文学”观	(123)
第二节 文艺批评观概要	(133)
第三节 先锋文艺与大众文化	(149)
附：论侦探小说：葛兰西、福柯与罗兰·巴特	(168)
第五章 转向因由	(179)
第一节 文化主义	(180)
第二节 结构主义	(202)
第六章 转向成果	(225)
第一节 化用霸权	(225)
第二节 提炼接合理论	(242)
第三节 构想抵抗的知识分子	(256)
结语 葛兰西研究与中国语境	(272)
参考文献	(280)
后记	(293)